

清华简与儒家经典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江林昌 孙 进

副主编 刘国忠 代 生
李秀亮 马 兴

清华简与儒家经典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江林昌 孙 进

副主编 刘国忠 代 生
李秀亮 马 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简与儒家经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林昌，孙进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7-5325-8384-3

I. ①清… II. ①江… ②孙… III. ①简(考古)—中国—战国时代—文集②儒家—文集 IV. ①K877.54-53
②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4444 号

清华简与儒家经典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江林昌 孙进 主编

刘国忠 代生 副主编

李秀亮 马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5 插页 5 字数 463,000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8384-3

K·2302 定价：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本书出版受山东省教育厅
“泰山学者论坛”经费资助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成果

本书为山东省委宣传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研究项目”(15BZBJ13)成果

前言

2014年12月4~7日,由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联合主办的“泰山学术论坛——清华简与儒家经典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烟台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台湾“中研院”、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东华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达慕思大学、里海大学,德国纽伦堡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及40多位博士、硕士参加了本次会议。著名学者李学勤、艾兰、夏含夷等均在会上做了主题演讲,奉献学术卓见。这次盛会的缘起,自然是因为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这批竹简甫一公布,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其内容涉及《周易》《尚书》《逸周书》《诗经》《左传》等经、史典籍。2012年下半年,我们即与清华大学领导与清华简负责人李学勤先生商定,在烟台联合举办一次学术会议,后又得到了山东省教育厅“泰山学术论坛”的经费支持,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2013年11月26日习总书记视察曲阜三孔,2014年9月,在世界儒学联合会等单位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又发表重要讲话。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理应在相关研究中做出特别贡献。因此,我们的会议主题确定为“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研究”。为了能够争取更多学者的莅临,我们还将会期做了多次推迟。我们认为,本论文集集中专家学者提供的高层次论文是对儒家经典研究的有力推动与开拓。

19世纪末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遗书的发现,给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1917年,王国维先生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殷墟甲骨卜辞研究《史记·殷本纪》,证明司马迁所叙殷王世系大致可信,商朝的存在不容置疑,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夏朝历史奠定了基础。同时,王国维的宏文又纠正了其中一些世系的讹误。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讲授《古史新证》,在分析了“信古”与“疑古”多有偏颇之后,从理论上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

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对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指出,王国维先生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方法,“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先生还在多个场合进一步阐发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如1930年在《陈垣燉煌劫余录序》里指出: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王、陈之后,“二重证据法”成了整个20世纪文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学界称之为“新证派”。如于省吾先生的《双剑謠尚书新证》《双剑謠易经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泽螺居楚辞新证》,陈垣先生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都是影响深远的学术名著。至于后辈学者,以考古发现继作文史新证者,不计其数。我们这次会议,以“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研究”为主题,也正是遵循这一传统,从而希望在新的时代做出新的贡献。

学界重视清华简,不仅因为其年代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前的战国中期,而且因其内容是经、史方面的。大家知道,殷墟甲骨卜辞是有关王室贵族的宗教占卜记录,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王室贵族的祭祀颂辞,都属于王官文化,可以直接印证史事,但毕竟只是片言只语。而清华简则是整篇整篇的文献典籍,内容比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丰富多了。20世纪不断发现的简帛,虽然也有许多典籍,但其年代大多是在秦至西汉,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孙臆兵法》《晏子》《尉繚子》《六韬》《太公》《唐勒赋》等,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竹简《论语》《文子》《太公》《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儒家者言》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黄帝四经》《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等,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竹简《诗经》《周易》《仓颉篇》等。这些典籍虽然内容重要,但毕竟年代稍晚,在印证先秦传世文献的可信性方面,稍显逊色。还有一些简帛,虽然年代是先秦的,如湖北江陵望山简、天星观简、包山简,河南新蔡葛陵简等,但其内容主要是遣册、日书、民间祭祷之类,属于小传统,不是整篇典籍,文献价值不高。年代既为先秦(战国时期),内容又为典籍的,只有1956年出土的河南信阳长台关简(有《墨子》佚篇),1987年出土的湖南慈利石板村简(涉及《国语》《战国策》《越绝书》等内容),1993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简(儒道文献),1994年从香港购回的上博简(儒道文献),和2008年从香港购回的清华简。尤其是清华简,其内容有关《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春秋》类、《礼》《乐》类等。这些出土文献,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先秦经典文本内容及其起源、发展、流传、分合等问题,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为我们探求先秦两汉民族经典原貌提供了科学方法,而大量出土文献又为这种科学方法的实践提供了宝贵资料。我们这些生活于这个时代

又从事文献工作的学者,确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是十分幸运的。其实,“二重证据法”的意义还不仅于此,我们的工作也不能仅止于“新证”的层面。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在整个中华文明史背景下,去分析总结这些新证后的典籍中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内涵,揭示民族特色,为今天的中国道路提供历史依据,为今天的道德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清华简的最终意义应该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正如李学勤先生在《清华简的文献特色和学术价值》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之所以着重提到清华简中的经史类文献,不但是因为清华简中这些文献所占比例高、数量大,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经史类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

中华文明由五帝时代起源,经虞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至春秋战国时代而出现了大变革,迎来了文化大繁荣。学界称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期,而之前的虞夏商周则为前轴心期。《易》《书》《诗》《礼》《乐》等典籍酝酿于前轴心期,而《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以及《老子》《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楚辞》等诸子著作则形成于轴心期。这些典籍是在人文理性精神觉醒后的中华先哲们对前二千多年来农耕文明进程中有关民族奋斗、巫史传统、集体经验的全面总结和精炼记录,并在此基础上面对新的文明形态而第一次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学者们称这些典籍为中华民族元典。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华儿女,都在这些民族元典思想内容的引导下奋力前行。可以说,这些民族元典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培育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塑造了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华文明轴心期的民族元典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与印度轴心期的吠陀经、佛经,希腊轴心期的荷马史诗、哲学著作,希伯来轴心期的《旧约圣经》等一起,共同奠定了整个世界几种不同的文明特质和文化方向。

1947年,巴基斯坦的一位牧童在死海西岸寻找丢失的羊群时,发现了一卷写满希伯来文的破羊皮。此后,考古学家循此线索在死海沿岸发现更多的文字羊皮。学者称之为“死海古经”。经专家鉴定,这是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中叶的犹太古经和其他古文献的手抄本。“死海古经”的发现,迎来了犹太《圣经》及相关古籍研究的新时代。清华简连同前面提到的长台关简、慈利简、郭店简、上博简,都流传于中国的轴心时期,对于我们重建中国古典学,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对中华民族元典怀有崇高敬意,对传承弘扬民族元典精神,并使其在现代化建设中作出转化创新怀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我们精心组织“清华简与儒家经典”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希望能在在这方面做点有意义的工作。

本次会议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同与重视,会议上的热烈讨论,非“前言”短短几句话所能概括。有关具体情况,还请参看正文。会议的成功举办,还与中国先秦史学会、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有关。现在,我们将学者的论文结集出版,既是对这次盛会的纪念,更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研究的不断进步。

江林昌

2017年9月于泉城

雅集群贤文 博通清华简

清华简与儒家经典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烟台大学举行随记

章方松

(福建 温州)

甲午大雪，蓬莱絮飞，漫天皆白，黄海潮起，烟台大学，群贤毕至，雅集研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儒家经典，国际学人，相聚一堂，风华意气，兴会无前。

论坛启幕，众神意举，李公学勤先生统领导航，门生江林昌主持，甲骨大家艾兰论禅让之兴，易学名家夏含夷讲易之道，博通学人邢文阐竹简与国家精神。众家论道，各抒己见，悟思东西，众议思辨，睿智卓识，明德耀光，析远古文明之涵义，释多维视野之博通，阐祖国源流之文脉。人人是太阳，处处闪智光。我为向日葵，向阳倾光源，感应妙理智，殊胜感灵识，竹存古意天人文，名士雅言清华简。学术之妙于人文精神，感发人类自性智慧光芒。简帛隐义成显学，显学为道论，道论宏新中华人文，溯源寻流，理涵深蕴，钩沉探赜，循迹阐秘，先哲遗绪，潜德幽光，默契达道，回归本真。清华简掀中国古文化学术之高潮，扬中华国际学坛之风采，引海内外学人之赴学，兴论当下，博论精辩，乘风破浪，昂然向前！为天下学人皆所注目，此乃李公学勤先生之功也。

山东为泰山岳巅，儒说源地，尼山论坛，名誉世界。今喜逢竹简论坛，儒典今解，名士荟萃，盛会于世，鄙人添于末位，随缘际遇，感恩铭记。

目 录

前言	江林昌	1
雅集群贤文 博通清华简	章方松	1

清华简《筮法》与《周易》研究

关于清华简《筮法》的五点认识和五个问题——在清华简与儒家经典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李学勤	3
筮法还是释法？——由清华简《筮法》重新考虑《左传》筮例	夏含夷	9
读清华简《筮法》	刘大钧	17
清华简《筮法》果占与商代占卜渊源	沈建华	23
清华简《筮法》筮占法探微	林忠军	29
巽之祟——《筮法》中的阴卦与女性角色	柯鹤立	37
从《筮法》与《周礼》谈占筮“三十三命”	季旭昇	47
谈《别卦》的卦序与卦名及其与《筮法》的关系	魏慈德	56
关于清华简《筮法》“雺”命解说的若干问题	姚小鸥 高中华	62
论清华简《筮法》卦位图与四时吉凶	张克宾	66
清华简《筮法》与《周易》卦画之谜	刘光胜	74
清华简《筮法》补释	蔡飞舟	82
论清华简《筮法》之祟	董 春	93
清华简《筮法》筮数的三种可能演算	刘 彬	101

读清华简《筮法》札记	李 锐	108
从清华简《筮法》等出土文献中的相关内容看京房“六十律”及“纳甲”说 之渊源	张文智	111
辑本《归藏》源流蠡测	程 浩	123
谈数字卦的名称概念与数字卦中的易学思维	贾连翔	130
清华简《卦位图》哲学思想考辨	蔡运章	134

清华简与其他历史文化研究

清华简与国家精神	邢 文	149
由清华简论“颂”即“容”及其文化学意义	江林昌 孙 进	154
清华简《命训》初探	刘国忠	175
清华竹简及齐史偶札	孙敬明 吉树春	181
清华简《系年》所见的“卫叔封”	董 珊	188
从吕相绝秦辞看穆、康时代的秦晋关系——清华简《系年》与 古书对比研究之二	代 生 马 兴	192
由清华简《系年》再论“国人暴动”的性质	李秀亮	200
清华简《系年》所见“山东时期”越国的军事与外交	陈民镇	205
清华简《系年》“缙人乃降西戎”小札	万德良	214
清华简、禹会祭祀遗址与河图的关系初探	何艳杰	217
清华简《金縢》、《祭公》“不豫有扈”的经典意涵	范丽梅	229
清华简《金縢》与武王克殷在位年数研究	吕庙军	236
传世古文尚书《说命》篇重审——以清华简《傅说之命》为中心	程 薇	247
清华简《说命》补说	魏 栋	256
清华简《良臣》散宜生与西周散氏	陈颖飞	261

其他简帛与历史文化研究

论《书》与《尚书》的起源——基于新近出土竹书的视角	艾 兰	277
---------------------------------	-----	-----

上博楚简《恒先》新释及其简序与篇章结构新探	范毓周	285
上博简“诗亡隐志”与先秦楚地诗学抒情传统	陈 瑶	303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与相关简帛释读	刘信芳	313
新蔡简“邲追”综论	蔡丽利	322
利簋为成王世作器考证	曹汉刚	329

附 录

清华简(肆)相关图表	341
后记	345



清华简《筮法》与
《周易》研究





关于清华简《筮法》的五点 认识和五个问题

——在清华简与儒家经典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李学勤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给大家介绍清华简《筮法》。我自己深深知道，在座的许多学者对《筮法》都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研究。在此，我想根据个人的认识，提出一些问题，请大家批评指正。

今天这里有不少学生，所以我想先用几分钟时间就清华简的基本情况做些介绍，同时也回答大家之前经常问我的一些问题。清华简是在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的。这批简是盗掘出土的，所以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即这批简是什么地点出土的，是什么时候出土的？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这是盗掘的简，他们不会告诉我们实际具体的地点，我们只能说综合各方面考虑，是从楚国地域内出土的。至于这批简是什么时候被盗掘出土的？经过反复调查，有一些线索，即这批简在2006年冬天已经出土了。因为当时在香港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就流传着这批简的消息。这批简的内容是以经史为中心的，其数量经清理后详细点数、拍照，公布的数字是2388枚。之后，通过红外线等技术手段，我们又找到了一些小的碎片，加起来共有2500枚左右。拼合完整的简大约在1700~1800支。关于简的书写时代，有两点要说明，一是写定这个简的时代，不是简中内容的成篇时代。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角度考察，一般认为简的写定年代应该是属于战国中期偏晚或者战国晚期偏早，大约就是战国中晚期之间。后来，我们用无字残简进行了碳十四测定，结果为公元前305±30年，大约为公元前300年左右。这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估计的年代基本相当。为了便于了解公元前300年前后的时代，我常常借用明朝觉浪道盛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战国时代有“三子会宗”。“三子”即孟子、庄子和屈原。他们同时在世，但未见过面，公元前300年，孟子已经老了，庄子正当年，屈原还是年轻人。今天的清华简中即载孟子引用过的《尚书》的话，恐怕孟子真的读到过

此《尚书》的内容^[1]。这是关于清华简的基本情况。

再谈谈关于《筮法》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图,我们称这个图为“摹本”。通过这个“摹本”,大家可以看到《筮法》简的大致原貌。这批简于2008年7月15号入藏清华大学后,我们立即着手清理和保护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批简虽然来的时候看着是带着泥土的一包完整的東西,但实际上已经散乱了。散乱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地下原来就有所散乱,盗墓人当时是否能完整地将所有竹简取出是很难说的;二是在流传过程中,也就是从2006年至2008年之间也可能出现散乱。因此,要将这些简恢复到原状并非易事。我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排比、缀合等工作。其间,就看到了有一卷简,原来是卷成一卷,其中有一部分是散乱的,但仍保持着成卷的样子。这个情况是非常罕见,也非常宝贵的。这卷简就是《筮法》。

现在看到的《筮法》简是非常完整的。虽然大家从整理报告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每支竹简之间有一条缝隙,那是为了便于大家阅读和观看,如果排列太密就分不清楚了。《筮法》简基本保持了简书的原状,没有什么损坏;而且其次序也没有问题,因为每支简的下面有从第1支简到第63支简的编号,不存在排序的疑难问题;简的背面没有字。这是《筮法》简的基本情况。

当我们见到《筮法》简中有明显的数字卦的记载,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因为这涉及古文字学界多年来一直关切的数字卦问题。大家知道,用数字来表现的易卦,其为学界所知,最早可追溯到北宋年间。北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在今湖北省孝感市(古称安州)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通过研究,可以确定这批青铜器的时代为西周昭王时期。由于带铭文的青铜器共有六件,所以被称为“安州六器”。“安州六器”中有一件是中方鼎,其铭文中就附有数字卦。可是当时的人们对金文的研究和认识还是初步的,所以将其中的数字当作字来进行释读。即使到清代陆续有了一些新材料,也没有人进行整理和研究。真正对数字卦展开研究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西周甲骨文和其他一些材料的出现,一些学者开始注意这一问题。而真正将这一问题提到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是在1978年在长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古文字学会议。会上,张政烺先生做了一次讲话,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他提出了上述材料应该用数字表现的易卦。在这之前,唐兰先生在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研究时认为,这是数字,但只是一种佚失的文字。我本人在1956年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这些材料应该跟《周易》的九六有关系,当时也只是一种猜测,没有进行细致的考证。而张政烺先生1978年则正式开始讨论这一问题。我个人一直猜想,张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湖北天星观简的发现有关系。当时天星观的竹简上已经出现了数字卦。无论如何,张政烺先生从一开始就将甲骨文、金文、楚简中有关数字卦的材料放在一起研究,而且指出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就

[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版;李学勤:《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3期。

这点来讲,是张先生开启了数字卦的研究。从那时起到现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对数字卦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期间,虽然各种材料不断被发现,但从没有出现过系统的材料能够完整地论述数字卦问题。而清华简《筮法》则是系统论述数字卦的典籍,这就是我们感觉特别兴奋的原因。以上是讨论《筮法》简的背景。

在《筮法》简的整理过程中,清华大学的同仁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很多想法。这些想法是否正确,希望大家指教。

下面,我从个人研究的角度,谈五点《筮法》简的认识,同时也提出五点理论问题,向在座的各位学者请教。

一、数字卦是一种用蓍草进行占卜的体系。《周易》传统的占卜方式就是用蓍草。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没有见过蓍草。记得 20 多年前我到河南淮阳的少昊陵,看到少昊陵后面有一大片绿色植物。有人告诉我这些都是蓍草。每根蓍草采下来后,很长,又硬又直。我取了一些想带回家,但上不了飞机。有些人提出是不是存在其他方法进行占卜,比如掷色子,或者后来用金钱卦等类似带数字的方法。从《筮法》简的内容本身来看,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筮法》简的最后有一段概括全篇的话,提到“各当其卦,乃力(扌)占之,占之必力(扌),卦乃不忒”。就是说,要进行占筮,必定要有“扌”这样一个环节,否则,占卦就会出错。大家知道,“扌”的本义是手指之间,指代夹在手指之间。《周易·系辞上》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扌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扌而后挂。”正可对照起来理解。既然《筮法》中提到了“扌”,那就一定是用蓍草进行占卦,而不是其他的方法。尤其最后一段是用韵语写成,也显示出它贯穿全篇主旨的重要性。

二、《筮法》的数字卦一定是表现成两个并列的六画卦,都是成对的。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现在所有能看到的楚简的筮例,如天星观简等,都一定是并着写的一对。大家知道,楚简是很窄的,在这样窄的空间里还要并着写,它一定是有目的的,否则完全可以上下写,比如中方鼎就是上下写的,但楚简一定要并着写,即使是在非常窄的竹简面上也要并着写。我们通过对《筮法》的初步考察,认为这是与四位观念有关的。因为两个六画卦等于四个三画卦,四个三画卦分为四个位。在这一点上六画卦与传世《归藏》是一致的。按照宋朱震写的《汉上易解》记载,传世《归藏》应是六画卦,卦皆六画。罗苹注《路史》:“卦皆六位。”

三、《筮法》占筮吉凶,解读卦象时,跟《周易》的卦、爻辞没有关系,而且连六十四别卦的名称都没有,只有八经卦的名称,当然作者肯定不是不知道别卦的名称,因为我们整理的简中还专门有一个别卦的表,而且此表也与《归藏》有关系。我们看《左传》《国语》中的一些筮例,通常要引《周易》中的卦辞或爻辞。那么如果说它与《周易》没有关系,那是否与《归藏》有关系呢?王家台秦简《归藏》内容与传世《归藏》的佚文也是有卦、爻辞的。

四、《筮法》的八经卦名称与《归藏》是最一致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坤”字,简文作“𡗗”,上面从申,下面从大,这是一种古文写法,见于《归藏》。郭忠恕《汗简》、山西《碧落碑》都

见此字,可能都源于《归藏》。《归藏》的特有写法是“奥”^[1]。“坎卦”简文作“劳卦”,《周易·说卦》第五章称坎“劳卦也”,传世《归藏》写作“𣎵”,即“劳”字。最有特点的是《归藏》震卦作“𣎵卦”,而简文作“𣎵(来)”。至于为什么震卦或称作“来”,还需要向在座各位请教。这些都说明,简文八经卦是最接近于《归藏》的。另外,《别卦》表中的卦名也与传世本《归藏》非常接近。这些都可以肯定《筮法》与传世《归藏》辑本有密切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传世《归藏》辑本就是商代《归藏》。我个人不敢同意。

五、关于《筮法》卦位图。很高兴在这次会议论文中看到有专家对《筮法》卦位图给予了高度评价。现在所能够看到的古代卦图中,《筮法》是年代最早的,是一种后天八卦,但又与后天八卦不太一样。卦图中间还有一个人形的图像,我们取名为“人身图”。无论如何,除了“劳(坎)”与“罗(离)”两卦的位置背反之外,《筮法》卦位图基本同于《说卦》第五章;“人身图”也是除这点外,同于《说卦》第九章。另外,在筮卦中的讨论有一个很普遍的原则,就是所谓乾坤六子。这一点也与《周易·说卦》第十章所记相符。虽然不是按《说卦》的长、中、少,而是按少、中、长的顺序。这样看来,公元前300年这个《筮法》写本与《说卦》有关。大胆地推测,我认为《筮法》应晚于《说卦》,因为许多人总怀疑《说卦》晚出至汉宣帝时河间女子所得,看来还是可以讨论的。

以上就是我的五点认识,是否正确,在此向大家请教。下面,我想再谈五个问题。我最早看到《筮法》时,曾认为数字卦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可是读过之后,感觉不是问题减少了,而是问题增多了,不懂的东西更多了。昨天晚上拜读大家的论文,看到也提出了一些类似的问题。现在将自己的五个问题介绍一下。

第一个问题。数字卦自1978年古文字研究会上张政烺先生正式提出并受到学术界的注意之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商代和西周的数字卦与楚简上的数字卦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我认为这一观点还需要讨论。如果确实是一脉相承,那么需要论证,毕竟还存在许多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比如,北宋重和元年发现的中方鼎材料有2个,786 666和876 666,这是一对。我们试着按张政烺先生讲的原则转换成易卦后,与《周易》的经文比较相符。前几年在陕西沔西西阴村出土的两个陶拍子,上面的卦序也多与今传本《周易》卦序一致,说明应该与《周易》相关。再明显的一个例子,北京大学董珊教授在这儿,他发表了有关鼎卦戈的文章^[2],鼎卦戈用的就是《周易》的经文。这样看起来,的确是与《周易》的卦爻辞有关,而在《筮法》中却找不到这样的相似性。那能不能说就是从商代和西周发展到战国呢?中间的春秋到战国前期这几百年又是什么状况呢?我们从未发现过任何材料。这个问题值得

[1] [清]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 董珊:《论新见鼎卦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4年1月8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207。